

文学语言学

李荣启 著



人民出版社

山雨... 移時而獲損於此而... 乃積雲風疾屢時... 性者矣朕心憂... 孰長齡... 泉近懷... 斯源不... 然...

文学语言学

【李荣启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兴民 张维训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伍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语言学/李荣启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01-005000-7

I.文… II.李… III.文学语言—研究 IV.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366 号

文学语言学

WENXUEYUYANXUE

李荣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西郊伟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30 千字 印张:12.75

ISBN 7-01-005000-7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是撕扯不开的：一方面，文学用语言写成，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没有好的语言，也就没有好的文学；另一方面，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也首先是从语言开始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的语言不“抓”人，读者很可能会放弃阅读，抽身而去。而对于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抓住了语言问题，就等于抓住了文学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样，无论从哪方面看，谈论文学，都无法脱离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文学赖以栖身的家园，语言也是文学研究的第一入口。

实际上，在中外文论史上，从古代到当代，许多学者都对文学的语言问题发过言，只不过他们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存有不同看法。大体而言，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基本上是“工具”说，即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内容具有“优先权”，而包括语言在内的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位置。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则持“本体”说，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是被语言建构出来的。尤其是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内容，而是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这样，语言不再是媒介、手段、载体和工具，而是成了存在本身。哲学观和语言观的变化，自然也引起了文学观念的变化。当代西方的文学理

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语言观，并在这样一种观念下开始重新思考文学与语言的基本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文学界和文学研究界开始注意到文学语言问题的重要性。比如，作家汪曾祺在他的《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揉面”——谈语言》等系列文章中，就把语言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令人耳目一新。他说：“语言本身是艺术，不只是工具。”“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自此以后，文学研究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语言问题的文章多了起来，一些学者也借助于本体论的东风，写出过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专著。然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新的现实问题对文学理论构成了一种挑战，一些学者开始与文学的“内部研究”脱钩断奶，从而转向了文化研究。在这股“文化转向”的浪潮中，文学语言问题也被束之高阁。尽管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在一些新潮学者看来，再来谈论文学语言问题似乎已显得不合时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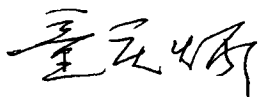
于是，当我读到李荣启的专著《文学语言学》时，我首先感到的是欣喜。当一些文学研究者已远离了文学，甚至对文学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她却能够“把浮躁喧嚣挡在门外，心安气定地坐在书桌前研读名著名篇”，花4年时间去思考一个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这种精神和勇气首先值得肯定和褒扬。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确实有点心浮气躁。一些研究者唯西方马首是瞻，匆匆忙忙地追赶着一些时髦的话题。在这种追赶的过程中，他们抛开了文学，其研究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也许有价值，但是却无法适用于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有更多

的像李荣启这样的学者来直面文学，来直面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只有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读完李荣启的这部著作后，我又发现她对这个问题是下了大功夫、花了大力气的。其思考之全面、论述之精微、分析之透彻，是以往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所不多见的。作者对文学语言观念的流变（从载体论到本体论）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第一章），这就为她切入这个问题铺好了一个研究的平台。通过对文学语言性质的辨析，作者绘出了文学语言观念发展变化的图式，这又为文学语言学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在这个基础上，作者既分析了文学语言的结构与特征，也剖析了文学语言的类型，同时对文学语言的形式美和风格也做了深入细致的阐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全书中用一章的篇幅来谈“文学语言的接受”。作者先是分析了文本对象与接受主体各自的特点，接着从诸多心理要素入手，阐述文学语言的心理接受机制，最后她认为文学语言接受有三个特征：有限与无限，正读与误读，可言与不可言。在我的阅读经历中，以往谈论文学问题的著作对接受这个环节或有疏漏、或论述不精，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个问题谈论起来难度较大。而研究文学语言，缺少了接受这个环节又是不完整的。李荣启把读者作为审美主体，并运用相关理论来思考其中的奥妙，这就既把文学语言的研究落到了实处，也避免了接受美学那种完全从形而上层面论述的空疏。这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也是文学语言研究的一个可喜的收获。

多年以前，我就结识了李荣启女士，她的勤学善思与刻苦钻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今，她拿着厚厚的一叠书稿找我，更坚定了我先前对她的印象。从这部书稿中可以看出，她最近一些年的潜心修炼已经结出了一个沉甸甸的果实。她的知识面很宽，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她动用了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阐释学等多方面的理论，她又能够融会贯

通，为我所用。李荣启还年轻，我祝愿她能以此为突破点，在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李', '荣', and '启' (Li Rongqi).

2004年12月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导 论

—

文学语言学是在文艺学（文学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领域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尽管这门学科是坐落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传统的理论基石上，并有前人不间断地探索和研究，可是它距离成为一门完整的、成熟的学科仍显遥远，迄今尚未形成自己的一套概念、原理、规则和方法，没有构成完整的文学语言学的理论体系。造成这门新兴学科发展缓慢及缺少建设性研究的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人们的文学语言观念滞后，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未能从本质涵义上给出确切、完整的阐释。

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是依附于西方知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思想的“工具”、“媒介”、“载体”、“形式”，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因而，形成了自古希腊直到近代语言学研究中的事物——思想（观念）——语言的思维模式，即认为思想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语言则是表达这种思想观念的符号和工具。内容有“优先权”，语言等形式因素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从属地位。受这种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的支配，我国文学艺术理论界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多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界更关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理论家们往往偏重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及美学等视角研究文学艺术，习惯于对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综合研究方法，偏重于文学内容要素的研究，而形式与语言往往作为内容的

附属因素加以分析,并且这种作为内容附属的语言分析又常常流于表面化与一般化,许多问题没能重视和研究,恰如童庆炳所说:“至今我们在文学语言方面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文学语言的种种问题,只停留在浅层的描述上。如语言在文学中到底具有什么功能、处于什么地位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作家呼喊‘语言的痛苦’呢?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又是什么呢?”^①刘大枫也指出:“由于在文学中没有真正确立语言的应有地位,所以以往关于文学语言的研究,也多属隔靴搔痒,譬如对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其特征究竟是什么,只是涉及到了‘形象的间接性’和‘灵活地多方面地展示社会生活’这两方面,并且缺乏深入和展开;而对于语言作为构成文学作品的材料,究竟有何特性,作为表现文学作品内容的工具和手段,在实现目的方面如何可能,除修辞技巧,许多重要问题都未曾涉及。”^②

在各种文学理论教材、论著中,论及文学语言的文字,立专章者较少,多数只把其列为某一章中的一节,或最后概述一两段,一带而过,对文学语言问题既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能进行深入的探讨,大多只是沿袭传统的说法,人云亦云,以至于当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审美学等学科纷纷从文艺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完成自己学科形态的建构的时候,而作为文艺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的文学语言学却仍然处于一种残缺的、零碎的、不系统的学科前状态。从语言学方面看,通常又过分偏重、依赖、倾向于常规语言,忽视乃至歧视文学语言在人类语言体系中所占的显著地位。这是导致文学语言学迟迟不能正式诞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文艺理论界,长期以来盛行的“载体”说,即语言是文学的表现工具,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它是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这种载体说具有一

① 童庆炳:《文学语言论》,见《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② 刘大枫:《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定的片面性，它把本来在审美反映过程中的结合在一起的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了。它阻碍着我们开拓文学创作、解读的广阔天地，并且错误地掩盖了语言文字的多层次、语言的潜文本。文学语言不只是文学最重要的形式因素，而且本身也具有内容性，它既是工具与手段，又是文学的对象与内容。语言是文学存在的家园。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与风格、语言与内容是融为一体的。文学语言学不只是研究文学语言技巧的学问，它多少已经具备了“文学整体论”、“文学系统论”的性质，只不过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语言”理论之上的。文艺学与语言学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两门学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要研究一切语言现象，在这个共同点（语言艺术、文学语言）上，这两门不同的学科产生了交叉关系。又由于文学语言在人类语言体系中所占的显著地位，在文艺学与语言学之间建立一门以文学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具有完整学科形态的文学语言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科学的必然性。

文学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这是文学原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文学语言的界定，过去，许多文学理论教材及论著中大都如此界说：文学语言有着广狭两种不同意义。广义的文学语言，泛指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的规范化语言，它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科学著作、政治论文和报刊杂志上所用的一切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口头语言。语言学中所使用的“文学语言”的概念，一般都是指广义的文学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是指文学作品的语言，即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散文等文学创作中的语言，以及人民大众口头创作中经过加工的语言。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文学语言”，通常指狭义的文学语言。这样界定文学语言，虽然分清了语言学的文学语言概念与文艺学的文学语言概念的不同，但对狭义的文学语言的界定显然太笼统、太过于简单。

事实上，文艺学意义上的文学语言的成立并不仅仅是因为某部作品使用了它，而重要的是因为这种能够构成一部作品的语言本身

有其独特的内在特性，即文学性与审美性。正是这些内在特性使它同非文学语言（科学语言、日常生活语言）区别开来。在定义文学语言之时，仅着眼于文学语言外在标志的自证式方法往往难以自圆其说。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认为文学语言是“指作家用来描绘艺术形象的语言，即文学作为艺术品，它对语言有特定要求，这些要求大体是：形象性、精确性和感染性”。^①用这样的定义是难以解释打破成规的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如意识流小说，梦呓般的语言，形象已淡化，甚至形象已悄然退出小说，作品中文学语言刻写出的是心理意识的流动。此外，对于文学语言的要求仅概括为形象性、精确性和感染性，这只能说是基本要求，不是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仅达到这个要求的文字产品并不都是文学作品。由于文学语言不同于科学语言、日常生活语言，因此，普通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而文学语言学则是研究一种特殊语言的特殊规律，更多的是研究它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功能、审美功能。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原理，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社会审美意识形态，因而文学语言的内涵与特点，必须由这个文学本体世界中的核心因素来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学语言是指文学作品中所使用的、体现文学性与审美性的、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学语言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艺术语言”（即艺术符号），但它不是另外构造一套完全独立的语言体系，文学语言的功能原本是潜在地存在于普通语言系统中的，文学语言是对普通语言的语音、语义等的审美特性的运用、加工与升华。同时，文学语言作为“言语”又加入了一个艺术领域，特定地加入了一个由它自身的叙述和描绘所构成的文学虚幻性的生活“情境”，因此文学语言又必然地具有自身的作为语言艺术的特征。所以，对文学语言的分析与研究，应当将文艺学视角和语言学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突破性的

① 黄世瑜主编：《文学理论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

成果。倘若忽视文艺学的视角,就难以说明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有什么不同,语言在文学中具有什么功能等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就不能建立起有别于普通语言学的独特的学科体系。反之,脱离了语言学视角,就会失去文学语言生生不息的活的源泉与文学语言创生的现实根据。文学语言学应当是把文艺学与语言学理论方法共同运用于、聚焦于文学作品语言时结出的硕果。

二

虽然文艺学与语言学原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学科,只是到了 20 世纪初,它们才开始互相关联。但是,在中外悠久的历史文化历史发展中,文学语言学的思想却有着丰富的蕴藏。古代许多优秀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以他们各自睿智的见解和独特的方式为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学语言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促其生长的养料。尽管他们的散金碎玉般的见解还不够系统,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些闪光的思想火花却为后人照亮了理论探索的前程,并给予后代学人深刻的启迪。文学语言学经历了漫长的学科前时期,这一学科前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学科形态时期与准学科形态时期,两者的分界线是 20 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

中国古代对文学语言的发展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1. 在文学语言的文艺学研究方面,古人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论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等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在讨论哲学问题、逻辑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同时,都对语言问题发表过颇有意义的见解,其中一些见解涉及到文学语言学问题。

老子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①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的真实性与艺术性关系问题的最早论断之一。他明确区分了“信言”即真实性语言与“美言”即艺术性语言。这大体相当于今人所说的常规语言与文学语言。但其见解的偏颇之处也很明显，即把“信言”与“美言”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能达到和谐统一。

孔子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是比较辩证的，虽然他的一些论断原本并不是针对文学语言而发，但历史上常被看做是对文学语言的经典性论断。如孔子认为文章的辞藻不要过于华丽，说：“辞达而已矣。”^②他要求语言要准确地表达思想内容，反对语言的雕琢和修饰，推崇语言的质朴无华。在文与质的关系上，他批评了偏重一方的片面性，要求做到文与质的统一。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③他认为文与质的关系处理不当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主张将文与质和谐地统一起来，进而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

对言与意的关系，庄子指出：“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④他认为世上的人所看重和称道的是书，而书却没有超过语言，而语言确实有它可贵之处。语言所可贵的在于它的意义，意义又有所指向。意义所指向的，却又不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然而世人因为珍视语言才传诵书本。虽然庄子所说的不可言传之物是指“道”，但这段充满辩证意味的论述却也说明了他已看到了语言与人类经验的层次和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到了魏晋玄学大师王弼那里，庄子的语言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

① 《老子》。

② 《论语·卫灵公》。

③ 《论语·雍也》。

④ 《庄子·天道》。

发挥：“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并进一步指出：“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①王弼深入地阐述了“意”、“象”、“言”三者之间的关系：“意”通过“象”得以显现，“象”通过“言”得以说明，但“言”只是为了“象”而存在，“象”只是为了“意”而存在，“言”和“象”都是载体，所以，他强调“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王弼这种主张主要针对汉儒繁琐的经学研究而发，从这个意义上讲，忘言忘象说对于打破汉儒死守章句、泥古不化的习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载体论的语言观念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荀彧继承了王弼“象”也不能尽意的思想，进而指出：“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②荀彧认为理之精微之处，是用语言和图像难以表达的，由此他提出了“象外之意，系表之言”的新说，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艺术形象的重要美学特征，对后代文艺学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后世文论家继承老庄孔孟等先人之余绪，直接或间接地论及文学语言，尤其是针对诗歌语言的阐述颇为丰富，为文学语言学的建立积淀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2. 中国古代在关于各种文体、各种诗体的语言规律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系统的成果。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论之作在阐述各种文体、诗体时，均从不同角度论及到了文体与语体、言与意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精深之

① 王弼：《周易略例·日月象》。

②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

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就从文章体裁与语体的联系上，揭示出体裁要跟语体相匹配的规律，并对不同体裁对语体的不同要求做了规定：“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指明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分别要与雅、理、实、丽四种不同的语体相配合。

陆机的《文赋》继承并发展了曹丕的文体理论，他将文章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体裁，然后逐一规定这十种体裁写什么和怎么写。不仅如此，陆机还从艺术构思出发，结合文学创作过程，比较深刻地揭示了言意关系在创作中的种种表现。他主张文学作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即辞意双美。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着重指出在处理构思之意与语言关系时，必须注意的四个问题及要防止的五种弊病。一要注意“或仰偃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对于文意前后矛盾，文与意互不协调之处，要进行剪裁，使彼此相称。二要注意“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即文辞繁复、内容庞杂，而文意却不符合所要表现的事物。三要注意“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于曩篇”，文意要避免雷同，力求创新。四要注意“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要保留精美的词句，避免作品平庸。要防止的五种弊病是：一是篇幅太小，内容单薄，前后失应，不足为文。二是语言乏力，美丑不分，文不协调。三是重词轻情，感情不真，文辞浮诡，不能感人。四是迎合时好，格调不高。五是清空疏缓，缺少真味。陆机的上述主张已经涉及到了文学语言运用的诸多原则，对后人正确运用文学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在探讨作文之原则和方法时，对文学创作中语言运用问题提出了不少深刻见解。在文与质的问题上，刘勰反对当时绮靡柔弱的文风，提倡既学习古代

质朴的语言风格，又恰当地施以文采，以形成文质彬彬的优良风格。在对文风总的要求下，对不同体裁与之相配的语体又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他在《定势》篇中指出：“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中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这就是说文章的体裁不同，语体风格就不同，这便是“随势各配”，“循体而成势。”在言与意的关系上，刘勰论述得就更为深入，他深切体验到文学创作中语言运用的困难，指出从艺术构思到语言表达往往“方其搢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那么，怎样解决文学创作过程中这种言不逮意的现象呢？刘勰认为作家必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并认为，从文学形象的审美特征来看，作家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意说尽，一览无余。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隐秀”说。何谓“隐秀”，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的话说：“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便是刘勰对于“隐秀”所作的基本规定，它深刻说明了文学创作中言、象、意的关系。刘勰的这些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审美规律，而且也论及到了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对后人具有极大的启迪。

刘勰之后，历代文论家、作家对文学创作中语言运用问题也多有关论，或从言与意的关系出发，强调言近旨丰，如钟嵘在《诗品序》中主张“文约意广”，反对“文繁而意少”；刘知几《史通》标举“文约而事丰”；沈德潜《说诗晬语》以“语近情遥”为贵等。或从语体创造的角度，强调语言锤炼的功夫，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皮日休）等。或强调语体中炼句、炼字的规律，如“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陆游）；“须参活句，勿参死句”（严

羽)；“诗以一字论功拙”(晁补之)等。

我国古代学者在他们的文论、史论之作中，或从语言学角度、或从语言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角度，论及到了各种文体、各种诗体在语音、语法、语义与语汇各方面的主要特点与基本要求。从风、骚、赋、骈到后来的诗、词、曲，无不从声律、节奏、句式等多个侧面加以概括；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到后来的古文、小说，无不从炼字、炼句、句法变化及修辞等多个角度加以评说，这些令人赞叹的成绩，均为文学语言学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3. 以训诂学为中心的“小学”研究也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发展。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最早叫“小学”，是从对文字的学习和研究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古代儿童进入小学首先学习文字。文字包括形、音、义三个方面，后来，这三个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隋唐以后，小学便成为这三门学科的总称。小学的显要地位也是由经学的显要地位造就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科学技术事业不发达，知识分子的主要学问就是经学。“经学”就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惟一出路，就是通经致仕。要通经首先得读懂经书，经书都是古书，后代读起来晦涩难懂，于是研究经典文献中的语言文字，引导人们读懂古书的“小学”应运而生。在我国传统的语言学中，小学研究与古代文化艺术有着不解之缘。小学研究是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即为读懂古书和学做文章服务的，比较注重实用，这就势必使语言研究与经典中包含的哲学、历史、文学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学家们对古代经典著作包括《诗经》、《楚辞》乃至李白、杜甫诗集等所有传世名作都逐字加以诠释，进行严谨细密的注疏考证与校订整理。这一工作始于汉代，最早的一批对经书的注释以及为读懂经书而撰写的《尔雅》、《说文》等辞书、字书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语言学的建立。到了清代乾嘉时期，语言研究和考据达到了顶峰。尽管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这种语言研究和考据只是停留在文献本